

金满楼
著

这是睿智的时代，这也是蒙昧的时代；
这是笃信的时代，这也是怀疑的时代；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也是绝望的冬天……

历史深处的叹息

走向民国的苍茫故往



从清朝覆灭前的垂死挣扎，到民国之初的纷繁乱世，短暂的十几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缩影。无论是立宪的风声，还是革命的浪潮，无论是保家卫国的大义凛然亦或夹缝中的苟延残喘，鲜活的晚近众生百相，迷离的事态万象，以今人的视角追溯仍然颇耐人寻味。

山东画报出版社

历史深处的叹息

走向民国的苍茫故往

金满楼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深处的叹息：走向民国的苍茫故往 / 金满楼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474-2663-0

I.①历… II.①金… III.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0820号

历史深处的叹息

金满楼 著

责任编辑 梁培培

装帧设计 王 钧

出版人 李文波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89号B座 邮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2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济南龙玺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毫米×230毫米

19印张 290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4-2663-0

定 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更换。

自序 历史的人事与复杂

历史要说复杂也很复杂，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用时间串起的人与事耳。

但是，人有千变万化，事有纷繁复杂，有时候想真正厘清，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不说笔者这样的历史作者，就算是大教授和资深研究者，也不敢对公众大声说：“看啊，我写的就是真历史，信我者，得真史！”

但是，能这么说吗？当然不能，能就浅薄了。所以，历史又是复杂的，因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笔直的单线运动，而是曲折复杂甚至前后反复的多向运动，其过程不乏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织，而且很多时候甚至是偶然性在起决定性作用。

正如清史学者戴逸在《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中说：“历史的前进并没有既定的模式，一切有待于人的努力、人的创造。而人的努力、创造也要有既定的社会条件做凭靠，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人们面临着多种机遇的选择，历史看似可左可右、可前可后。”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曾提醒世人：“（历史）事实就像浩瀚无边的大海中的鱼，史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在大海的哪一部分捕鱼以及他选用哪种渔具捕鱼，而这两个因素当然又取决于他想捕捉的是哪种鱼。”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史家想寻找的事实是甲，他就不大可能发现乙或丙，因为即使他

碰上了乙或丙，也不会认为它们有什么重要意义。

历史研究者的两难就在于，民众要求他“说出真相”，但他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历史的真相是无法真正厘清的。除了历史现场的不可逆之外，资料的不充分，加上叙述者、研究者本身不可避免的偏见都导致我们看到的所谓历史，是不完整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过度的历史虚无主义将导致一场史学的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有趣往往不在宏大的叙述，而是对细节的关照。细节对于植物来说，或许只是一枝树杈的生长方向，对于历史却是对一个时代最好的注解。而最让人感叹的是，历史的细节原本都是当时举国轰动的大事，只是被岁月的流沙掩埋之后，才显得微不足道而已。

当历史不能照亮未来时，人心势必一片黑暗。历史是人类的本源，因为我们太有必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了。

是为序，与诸君共勉。

目录

自序 / 1

第一篇 晚清迷梦：梦想难进现实 / 1

- 一 坚硬的膝盖：百年荣辱，不欠一跪 / 3
- 二 不道德的收入：清末禁烟的现实与悖论 / 11
- 三 旧秀才与洋进士：科举兴废与王朝残梦 / 19
- 四 英雄狗熊：甲午战争中的众生相 / 27
- 五 旅顺大屠杀：文明伪装下的兽性 / 35
- 六 春帆楼外：李鸿章的外交荣辱 / 41
- 七 伦敦蒙难：孙中山如何逃出生天 / 50
- 八 容星桥：从留美幼童到投身革命 / 57
- 九 卫汝贵送米：被唾沫淹死的前敌主将 / 64
- 十 小报涅槃：“《苏报》案”的“案中案” / 69
- 十一 皇帝的香案：假保路干掉了真铁路 / 79
- 十二 端方的不归路：革命洪流中的乱世高官 / 90

第二篇 寸步难行：共和举步维艰 / 99

- 十三 吴禄贞：非常人物的非常之死 / 101

- 十四 命殒张振武：武昌首义者的不归路 / 111
- 十五 留守黄兴：功未成而身先退 / 121
- 十六 王金发：一个山大王革命 / 128
- 十七 “强盗”与“腐儒”：陈其美与伍廷芳的隔空论战 / 135
- 十八 共和前夜：一个美国社会学家的中国观察 / 142
- 十九 阿Q的辛亥年：那个没画圆的圈 / 148
- 二十 难缠的“国辩”：剪不断，理还乱 / 156
- 二一 三寸金莲：小脚里的大革命 / 165
- 二二 少年溥仪：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 / 173
- 二三 共和下的阴影：民国旗人的乱世飘零 / 182

第三篇 乱世百相：荒诞意犹未尽 / 193

- 二四 杨度：一个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 / 195
- 二五 “辫帅”的复辟：笑愚笑忠说张勋 / 205
- 二六 革命之后：蔡元培的尴尬与两难 / 217
- 二七 史量才、沈秋水与收购《申报》之谜 / 225
- 二八 血溅佛堂：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中案” / 236
- 二九 得而复失又损将：张学良与中东路战争 / 247
- 三十 “碰瓷达人”章太炎：疯子还是大师？ / 259
- 三一 好人胡适：为什么就这么好？ / 271
- 三二 灵与肉：郁达夫孽缘未尽 / 281
- 三三 在华五十年：历史尘埃中的司徒雷登 / 288

后 记 / 298

第一篇

晚清迷梦：
梦想难进现实

一 坚硬的膝盖：百年荣辱，不欠一跪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场面极其隆重，在京各国使节都以为会受邀观礼。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主管清廷外务的总理衙门非但没有给他们送来请柬，反而派出官员吞吞吐吐地“友情告知”，请他们通知所在国侨民在皇上大婚之日最好不要外出——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内。

次年2月，同治皇帝宣布亲政，但仍无召见各国公使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

按说，皇帝大婚与亲政是热热闹闹的大场面，各国使节受邀观礼也是当时国际外交的惯例，为何清廷却对此唯恐避之不及呢？

这事还得从乾隆年间说起。1793年6月，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到中国，清廷官员在接待时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问题：英国人居然不肯向皇帝下跪！

乾隆皇帝听后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祝寿，最后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英国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单腿下跪是对中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乾隆眼中，这只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罢了。

事后，乾隆对马戛尔尼的觐见方式非常生气，其表示：“英咭利国使臣等

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愜。”随后他特别批示：“英咭利国使臣不谙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

由此，马戛尔尼的此次出访遭到了彻底的失败。25年后，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同样因为拒行三跪九叩礼而被“即日遣回”。两次风波后，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便成了中外交涉的大难题。

中国古代没有椅子，人们通常席地而坐。跪拜礼起源于古代“正坐”的鞠躬礼，其本身并无人格侮辱的含义。但随着专制皇权的日渐加强，跪拜礼开始变味并成了体现上下尊卑的等级强化剂。按照天朝的世界观，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之上国，万方来朝，四夷宾服，不独在地理上位于地球中央，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中华不论文字、道德、礼仪、制度，无一不优于四夷。

因此，臣民和外国使节觐见清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这一礼节不仅象征着清朝皇帝专制统治和尊严，其中也反映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在乾隆眼中，中国与海外诸国为宗主国与朝贡国的关系，英国也不能例外。现英使既以“贡使”身份前来“觐见”，当然应该“三跪九叩首”的“行礼如仪”。可惜的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英国并不认为自己是“外藩”下国，而是认为与中国地位平等。既然“中英平等”，当然没有以“贡使”的身份行“三跪九叩首”之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根本谈不拢。

乾隆朝正值国势强盛，当时还有本钱摆架子。到了道光、咸丰朝后，尽管中国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迭遭败绩，但列强的坚船利炮仍难以撼动天朝“体制”的硬壳。

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从天津攻至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亲递国书一条表示万难允准。因为亲递国书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否则只能交钦差大臣呈进。此系国体问题，万不可让步，如洋人“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战争的结果是英法联军攻破了北京城，咸丰仓皇逃往热河。事至于此，咸丰仍对“夷酋面见朕弟”（即留京收拾残局的恭亲王奕訢）一事耿耿于怀。即便英法联军已撤出北京，咸丰仍心存疑虑，他最担心的是洋人以“坚持入觐”

为要挟，最终不得不在殿堂之下面见“夷人”。为此，他宁可病死热河，也不肯返回京城。

1861年后，英法等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各国公使要求觐见，可又不肯下跪，这一问题成了清廷的一块心病。好在同治继位时仅6岁，总理衙门尚可以“皇帝年幼、太后垂帘听政”为由拒绝其觐见要求。但随着皇帝年岁的日益增大，清廷也就陷入了无尽的麻烦之中。

1867年讨论预备修约问题时，外国使臣的觐见礼即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其中，多数大臣认为应坚持行跪拜礼，不能对夷人让步。如山东巡抚丁宝桢所说：“彼既不行中国之礼，其桀骜之气，自难遽驯。”这代表当时一般朝臣的想法。

当然，其中也有相对开明的，如左宗棠即表示：“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其使臣行跪拜礼，使臣未必遵依。窃思彼族以见其国主之礼入觐，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此体限于呈递国书。”

这次的讨论并没有结果。6年过去后，同治成婚亲政，各国公使要求觐见清帝也就顺理成章。无奈之下，清廷只能将此问题再次付诸讨论。这次的论辩，仍可分为强硬与妥协两派，其中强硬派以浙江道监察御史边宝泉的主张最为激烈，其理由也最具代表性：“瞻觐不行跪拜，中国从无此礼，和约以来，该夷虽非属国，然其使臣亦与我中国之臣等耳，以中国臣子之礼待之，不为不优。”

翰林院编修吴大澂则在奏折中提出，洋人公使希望瞻仰我大清皇帝的天颜是一种有诚意的表示，难以拒绝。但之后，他话锋一转，称“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如果“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懣而不平”。

作为妥协派（或可称之为开明派）的代表，李鸿章则在回奏称：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朝廷礼制应随情势变通，既然已将西方诸国“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否则，列强以此为口实，吃亏的还是自己。

在主张各国使节觐见皇帝而不必强迫行跪拜礼的声音中，御史吴可读奏折

中的逻辑最为怪异，其称：洋人无异于禽兽，如果强使禽兽行中国之礼仪，不足为朝廷之荣，反之亦不为辱——这未免有些阿 Q 论的味道了。

经四个多月的反复交涉后，总理衙门最终与各国使节达成协议，其中要点有三：一是清廷同意外国使节“不行跪拜”而按西方的三鞠躬惯例改为五鞠躬礼觐见清帝，这样的话，双方各让一步，彼此不失体面；二是外国使节觐见时只可礼貌性致辞而不能涉及具体事务，如“遽然奏陈，国主亦可以礼谢却”，这主要是防止洋人趁机要挟皇帝；三是觐见事大，不宜轻举，外国使节应遵守“同见之例，迟早恭候，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用昭郑重”。

1873年6月，各国公使最终觐见同治皇帝，一睹天颜。对于中外关系史上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清实录》和《起居注》却并不愿详细记述，如《清穆宗实录》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六月壬子，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逊（赫），于紫光阁前瞻觐。”《起居注》中的记载更为简略：“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近代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的《清朝全史》中对此记载称：列强使节觐见时，“英公使（威妥玛爵士）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曰：‘尔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浹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

稻叶君山著作的中文版始见于1914年，其中对列强使节大出洋相的戏说性描写究竟是因为中外语言障碍导致还是黄种人的阿 Q 式胜利法（当时日本同为“黄祸论”的受害者，彼亦厌恶白人），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在晚清名士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倒有一段像是上文的出处，其中曰：“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

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

作为当事人，日本使臣副岛种臣的回忆似乎更能反映出当日的细节：“29日晨，……7时，由宝鋆、毛昶熙引导大使（副岛种臣）及郑（永宁）至紫光阁傍行幄中伺候。8时帝出宫，9时御紫光阁，宝、毛两大臣引导大使及郑自阁之左阶升，左门进（郑捧国书，在大使左肩后一步随行）……大使及郑开始进前，斜见宝座时，脱帽，作第一揖。再进至中央，正面对宝座时，作第二揖。又进，至御座所在之黄案前中央，立定，作第三揖（此为进见三揖）。……郑在大使左肩侧后一步，宝、毛两大臣分立黄案两侧，俱面北而立。去黄案数步之正北面设坛。坛上设高座，帝坐其上之龙椅上。座之左右，恭亲王及皇族御前大臣侍立。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文武显官，则在自坛下至黄案间之两侧分别对立。……大使以国书放置黄案上后，作一揖，陈颂来意，由郑译述毕，又一揖。帝有复书，恭亲王跪接，自阶而下，至黄案前，宣称：贵国大皇帝国书，朕收到了。大使作揖，恭亲王复班。……帝又下敕语，恭亲王又跪奉，下坛宣称：贵国大皇帝安康否？两国交际事宜，亲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平商议可也。大使作揖（此间揖无定数），恭亲王又复班。事既毕，大使又一揖。郑随从背行后退，至中央尽头处一揖，仍背行，至将见不着御案处，又一揖（此为退出三揖）。于是戴帽，仍由宝、毛两氏前导，至时应宫憩息。”

此处有个细节颇值得注意，按总理衙门与各国使节的约定，觐见时不行跪拜礼而行五鞠躬礼，但日本使节副岛种臣行的却是三鞠躬礼，这显然是一种破格的礼遇。清廷此举，似乎有一种“中日同文同种”的政治示好之意。

对这次的觐见，英法美俄等国公使大体满意，但唯独对觐见地点提出质疑。其理由是，觐见的地点紫光阁乃是“接见贡使的地方”，清廷的做法是故意将各国使节降格为昔日的贡使。因此，他们提出了更换觐见地点的要求（从历史上看，紫光阁并非是清帝接见贡使的唯一地方，譬如乾隆就在热河行宫接见马戛尔尼，而一些贡使来京后，遇大朝、常朝之期，往往与清廷大臣们随班觐见；如不遇朝期，则在便殿接受召见）。

英法等公使对此问题的非难，目的是想让清帝将太和殿作为外国使节觐见

的场所，但清廷对此断然拒绝。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紫禁城中规模最大的殿宇，也是明清两代帝王举行登基、朝会大典等重大礼仪的场所。因此，列强的要求并没有被满足。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法国新任公使施阿兰乘机要挟，清廷以文华殿作为觐见地点作为让步。1900年“庚子国变”后，列强再次提出在太和殿举行觐见仪式的要求。几经交涉下，双方最终约定以乾清宫（其地位仅次于太和殿）为觐见地点。

对于中国礼仪的认识与评价，丁韪良曾在《花甲记忆》一书中记载说：1858年，他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了《天津条约》的谈判，清朝大臣耆英与列维廉因为外交礼节发生争执：“他（耆英）建议列先生预先要排练一下接旨的仪式。但列先生拒绝了。耆英补充说：‘您得下跪受书。’列先生回答：‘不行，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但皇上就是上帝！’耆英说。”由此，丁韪良认识到清政府对于近代西方外交礼仪的无知。

当然，丁韪良也在书中承认，世界上最重礼仪的国家莫过于中国。中国古书即记载，“圣人垂裳而天下治”，即通过烦琐隆重的礼仪来使得臣民们对皇帝产生一种宗教性的敬畏。时至今日，朝廷礼制的威严气势仍与古代别无二致，礼仪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无独有偶，清末外交官颜惠庆在回忆录中也有同样的认识。有一次，他作为外务部部员参与了英国公使朱尔典觐见宣统皇帝并递交国书的仪式。据其记载，在宏大的宫殿中，英国公使向端坐在宝座之上的皇帝行三鞠躬礼，“隆重的仪式使殿内的氛围无比庄严，乃至见多识广的英国外交官在宣读祝词时也不免声音有些颤抖”。

甲午战败后，变法思维在年轻的士子中迅速流行，其中对辫子、跪拜等旧俗提出了猛烈的抨击，如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即向学生宣传：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只能受到外国人的讪笑。此议一出，湖南名儒叶德辉大起反对，其指责梁启超“欲易中国跪拜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

据高阳在《翁同龢》一书中的记载，戊戌变法前德国亨利王子访华，光绪

在接见时破除了各种旧有礼仪；但庚子年后，因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御弟载沣被迫前往德国谢罪。据说德皇一度要求中方在谢罪时行跪拜礼，载沣听说后托故不行。后在驻德公使吕海寰的交涉下，德皇才取消了这一侮辱性的要求。诚可谓“风水轮流转”，野蛮的并不止中国人。

作为唯一出过国的执政者，摄政王载沣的作风明显要开明许多。据清末任职于外务部的曹汝霖回忆，载沣在接见各国代表时非常热情，并与之一一握手，表示一种显明的欲求亲善的愿望。1910年后，载沣某次在养心殿召见官员，“太监引至门口，自行进去，行一鞠躬礼。三品京堂以上，隔案设座位。摄政王即说，坐下奏对。这是民主得多，不觉得拘束惶恐”。

曹汝霖还对比了前几年受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时的情景：“召见前一日，袁项城（即袁世凯）自海淀别业电话招见。……余遂驱车至海淀别业，以为必有事垂询。岂知见后即说，你明日初次召见，故特招你来将应注意的仪注告诉你。这种过节，不可不知，以免失仪。遂将怎样进殿，怎样跪对等应注意的事，一一告知。且谓应备一双护膝盖，琉璃厂有售的，恐跪久即麻，起立不便云。余深感其关切之意，谢之辞出。

“翌日黎明，即赴颐和园外朝房伺候。……余即随太监引导，进宫门，到仁寿殿门，引导太监即退。殿门门槛高近二尺，殿门内垂有又宽又厚的棉门帘，由殿内太监掀起让进，启落异常之快，若举动稍缓，可能一足在内，一足在外，又可能官帽花翎摔斜，即是失仪。幸项城指示，故已留意。进殿后，殿内漆黑，稍闭眼，才见偌大殿座，只有两支大蜡烛在御案上，御案下斜列拜垫一排，是为军机垫。遂在军机垫下面跪下，脱帽花翎向上，不叩头，静听问话。这都是项城告我的。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先由皇帝问：你在外务部当差几年？对：臣由商部调外务部当差，才不到一年。”

在现代人看来，跪拜导致身体扭曲，随之而来的便是人格的屈就，体现的是一种绝对不平等的价值观，这与现代社会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完全格格不入。如果跪拜是为了表示臣服与顺从，这种下跪是具有侮辱性的，这也是马夏尔尼和其他外国使节拒绝下跪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废止跪拜礼并规定鞠躬为正式社交礼仪。

当时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有位 80 多岁老先生前来瞻仰大总统的风采，见到孙中山后，老先生恭恭敬敬地行起了三跪九叩首的旧礼来。孙中山连忙拉他起来：“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先生恍然大悟：“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此说是否属实，目前尚难考证，但从专制向民主转型，废除下跪是一种象征性的进步，却是不争的事实。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随后正式宣布民国的通用礼节：男子礼节脱帽鞠躬，大礼三鞠躬，常礼一鞠躬，寻常相对，只用脱帽礼；女子大礼大致相同，唯不脱帽，专行鞠躬礼。1915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有人阿谀奉承，建议恢复跪拜，但袁世凯没有同意，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强求毫无意义。但是，没有跪拜的洪宪帝制仍不受欢迎并很快破产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下跪都是难堪而丑陋的。1970 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他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25 年后，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代表德国重申对 600 万犹太亡灵的歉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后，“跪”字就基本上退出了中国文化。但是，随着近年来宫廷戏的盛行，电视屏幕中的“扑通、扑通”之声又开始热闹了起来，诚可谓“跪之礼仪，乃‘国粹’也”。但愿，这种下跪之风只见于屏幕而非现实，只见于历史而非心中，则国人之幸也。